

沈从文 著

Shen congwen

抽象的抒情



复旦大学出版社
www.fudanpress.com.cn

抽象的抒情

沈从文 著

第2版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抽象的抒情/沈从文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8

(大师谈文学)

ISBN 7-309-04103-8

I. 抽… II. 沈… III. 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4894 号

抽象的抒情

沈从文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118853(发行部) 86-21-65109143(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孙 晶

装帧设计 孙 曙

总 编 辑 高若海

出 品 人 贺圣遂

印 刷 上海华业装潢印刷厂

开 本 890 × 1240 1/32

印 张 11.75 插页 2

字 数 263 千

版 次 2004 年 8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5 100

书 号 ISBN 7-309-04103-8/I · 269

定 价 1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说明

沈从文(1902—1988),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曾任教于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建国后任职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除了《边城》、《长河》等文艺创作之外,他还有学术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传世。

本书内容包括沈从文对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评介,其中主要分小说和诗歌两大部分。他较为系统地评价了新文学前二十年的创作,有些文章在当初发表时即因持论公正、观点率真而引起关注;另一大部分为沈从文对文学创作的认识和思考,沈氏文字均与其切身体验相关,有感而发,一语中的,又不空洞。虽为理论文字,但文笔优美,思想活跃,足见一代大家的才情和对文学的执著。其中部分篇章为近年才整理、发表的,作者以往的集子中并不多见。本书所收文章主要取自沈从文的《沫沫集》(大东书局 1931 年初版)、《废邮存底》(文化生活出版社 1937 年初版)、《云南看云集》(重庆国民图书社)以及《沈从文全集》(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等。本书选目经沈龙朱先生审定。

为了尊重原作,除了个别标点及明显的排印错误外,本书的一些习惯用法及其措辞均依旧原文排印,其中个别不符合当下习惯者,请读者谅解。

目 录

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	1
白话文问题	7
小说作者和读者	17
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	30
现代中国文学的小感想	38
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	43
再谈差不多	50
论中国创作小说	56
我们怎么样去读新诗	80
新诗的旧账	86
关于看不懂	92
谈现代诗	97
论冯文炳	101
论郭沫若	108
论落华生	115
鲁迅的战斗	118



的抒情

论施蛰存与罗黑芷	124
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	130
论穆时英	137
从徐志摩作品学习抒情	140
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	147
由冰心到废名	158
论汪静之的《蕙的风》	171
论徐志摩的诗	180
论闻一多的《死水》	193
论焦菊隐的《夜哭》	198
论刘半农《扬鞭集》	204
论朱湘的诗	211
从现实学习	222
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	244
水云	247
抽象的抒情	280
一个人的自白	289
总结·传记部分	305
总结·思想部分	325
《边城》题记	350
《边城》新题记	353
《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	354
《湘西散记》序	361

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①

世界在变动中，一切都必然得变，政治或社会，法律与道德似乎都值得有心人给予一种新的看法，至少是比较上新些的看法。文学自然不在例外，也需要一种较新的看法。文学运动要有个较好的“明日”，得从“过去”和“当前”知道些问题。这些问题平时照例是为一般人忽略过了的。

谈及文学运动分析它的得失时，有两件事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第一是民国十五年后，这个运动同上海商业结了缘，作品成为大老板商品之一种。第二是民国十八年后，这个运动又与国内政治不可分，成为在朝在野政策工具之一部。因此一来，若从表面观察，必以为活泼热闹，实在值得乐观。可是细加分析，也就看出一点堕落倾向，远不如“五四”初期勇敢天真，令人敬重。原因是作者的创造力一面既得迎合商人，一面又得附会政策，目的既集中在商业作用与政治效果两件事情上，它的堕落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作品成为商品之一种，用同一意义分布，投资者当然即不免从生意经上着眼，趣味日益低下，影响再坏也不以为意。“五四”谈男女解放，所以过去一时南方就有张资平三角多角恋爱小说出现，北

^① 本篇发表于一九四〇年八月《战国策》第九期。

方就有章衣萍《情书一束》出现，同时在国内都得到广大的销路。变本加厉，因此过不久张竞生所提倡性生活亦成为一时风气。……过不久，因北伐清党时代多禁忌，说话不易讨好，林语堂便办了一个《论语》，提倡“幽默”，又以一个谐趣通俗风格，得到多数读者。读者越多，影响也就越不好。这事情并不出奇，既然是商品，不管是百龄机，鹿茸精，只要宣传得法，推销合理，当然各有主顾。可是话说回来，作品变成商品，也未尝无好处。正因为既具有商品意义，即产生经济学上的价值作用。生产者可以借此为生，于是方有“职业作家”。其次是作品既以商品方式分布国内，作者固龙蛇不一，有好有坏，读者亦嗜好酸咸，各有兴趣。读者中比较少数，自然也盼望比较好的文学作品，能欣赏这类作品。作品中制作俗滥之物，固然在短时期中即可得到多数读者，作品中制作精工不苟且的，文字有风格性格的，慢慢的从纵的方面说，依然还有许多读者！既有读者，因此职业作家中少壮分子，便有不少对文学创作抱了一个比较远大理想，心怀宏愿与坚信，在寂寞中来努力的。非职业作家，且有不少人已近中年，尚有兴趣在个人所信所守一个观点上，继续试验他的工作的。这些人眼光当然不在制作商品，可是却恰好因作品可以用商品方式分布推广，引起各方面读者关心，方有许多优秀示范作品继续产生。

至于作家被政治看中，作品成为政策工具后，很明显的变动是：表面上作品能支配政治，改造社会，教育群众，事实上不过是政客从此可以畜养作家，来作打手，这种打手产生的文学作品，可作政治点缀物罢了。作品由“表现真理”转成“解释政策”、“宣传政策”，便宜了一群投机者与莫名其妙的作家。政策是易变的，所以这些人也尽在变，目前社会上就很有几个作家，如此永远在政客调排下领导文

学运动。虽提法前后矛盾,个人看来竟无所谓。只要在位,就已够了。“事实”照例是乏味的,所以一提及这点事实时,有些人便不免面赤颈胀,恼羞成怒,或貌若平常,心怀愤恨。这些人一部分照例还是无作品的作家。特点是虽无作品,还称作家。时而左,时而右。或因在官从政,或因列名某籍,在国内各处用“文化人”身份参加各种组织,出席开会,有什么事发生需要有所表示时,即在通电上列一大名。在什么集会中有贵宾要人莅临时,大家也凑和一场,胡乱畅谈文学艺术,或照老文人方式,唱唱京戏作为余兴,或即席赋诗相赠。再若遇着什么有势力者做做诗,写写戏,于是不问好坏,一例望风承旨,极力捧场。精神风度,完全如《金瓶梅》中之应伯爵、谢希大一流人物,本色是凑趣帮闲,从中捞点小油水。所不同处只是表面上这些人或留法留英,并非白丁。这种人进身照例是因缘时会,各以“思想”自见。思想或相反,或相承,都无妨碍。彼此之间过去一时虽常常相争相吵,俨然为真理而奋斗,十分认真,其实倒无所谓,只要“上头”政策一变,他们也就即刻会变。这些人平时尽管主张激烈,也不用担心,只要等到政治组织上需要天下一家同流并进时,他们就把“真理”搁下不提,携手合作,同处一堂,再也不会因为思想不同,便不肯吃同样点心了!这种人中还可分黠谄与老实两种:老实的只是好好先生,遇事不大思索。黠谄的却具家犬姿态,有权据势,因能支配风气,所以对下极骄,既用清客风度侍候贵人,所以对上又极谄。把文学运动真正极庄严的那一点思想问题完全谐谑化,漫画化。然而他们依然还是要口口声声谈“思想”,而且谈一切。其实什么都不必谈,只是做文人好了。这种人本来目的也就只是做文人。做文人的意义,是满足一个动物基本欲望,食与性。别无更多幻想与贪心,倒像是个很知足的动物。

文学运动既受商业与政治两种分割,尤其是政治引诱性大,作家为趋时讨功,多“朝秦暮楚”现象,与“东食西宿”现象。因此一来,把这些人普遍谐谑化与漫画化。所以到后来便有那么一种状况:真在那里写“作品”是一群人,装模作样在做“作家”又是一群人。写作品的照例沉默而诚恳,生活相当艰苦,一切还保留些书生气,除作品外社会上似乎很少他的露面机会。做作家的却必然活活跳跳,或如政客,或如丑角,成天到处奔走活动。这风气到民二十左右即见出端倪,民二十四以后,情形更加分明,民二十六以后,且有人什么事也不作,却以“文化人”身分到处招摇活动的。只要从报纸杂志上看看,我们便可发现,日常发表文学作品的,个人对读者都好像十分生疏,另外一群姓名在报纸上熟习的,有些人竟从无一个像样作品问世。这件事由外人看来,会觉得十分奇异,凡明白中国近十年文学运动,如何成为商业与政策附属物的人,应当不会如何奇异的!

就现象说来,实在可悲可悯而且可怕。虽然如此,说不定还有人正以为是种好现象。因为这些商业化的或清客化的作家论客,既不能独自为战,使作品与社会对面,自卑情绪和平庸愿望,都恰恰如应伯爵一流破落子弟与西门庆拜把兄弟后情形,以得与新贵人平起平坐,称哥唤弟,就认为是社会进步,感到满足,再想不到别的问题。这些人本来能力有限,发展有限。国家进步如果是多数的愿望,这些空空洞洞人物,既无能力从作品中有何建树,想依赖政治力量,从新的社会取得多数的信仰,自然是不可能的。但这些都“在位”,倚势有权,而且善于誇張为幻。问题也就在此,即一日在位,昨日与今日所有可悲可笑而且可怕现象,当然即一日存在。在新陈代谢方式下,这些人虽会受时间陶冶,完全失去意义,但促进这种新陈代谢的作用,却还需要一种新的文学运动,输入一个新的文学观,事极

显明。

个人觉得可关心的,还不是作家中的混混盘踞要津,结纳权贵,来控制文运。倒是我们这个社会,应当用什么一个方式,方能建设一个新的文学运动,给准备执笔者一个新的文学观?这新的文运新的文学观,从消极言,是作者一反当前附庸依赖精神,不甘心成为贪财商人的流行货,与狡猾政客的装饰品。从积极言,一定要在作品中输入一个健康雄强的人生观,人物性格必对做一个中国人的基本态度与信念,“有所为有所不为”,取予之际异常谨严认真。他必热爱人生,坚实朴厚,坦白诚实,勇于牺牲。作品中人格与作者人格,且必然有相通处。作品制作不拘拘于过去所谓思想左右的落伍机械观,也不关心作品在商业上的成功失败。他要做人,表现的是做个新中国的国民,应具有一种什么风度和气派!除自尊自重之外,还要如何加强自信!相信个人是国家一个单位,生命虽然渺小而脆弱,与蝼蚁糠粃,不相上下。然而纵如蝼蚁糠粃,只要不缺少向上信心,却可以完成许多大事!

如说过去的文学观,是浪漫情绪与宗教情绪混合物,浪漫情绪的成因,又与中国道德成分中的性禁忌或英雄崇拜迷信有关,因此一般人颓废悲观成分,纵极力抑制不在作品本身上抬头,也会在家生活中表现。新的文学观,就值得奠基于一个新的生物两性观上,如何去掉那些不良气分,多注入一分健康有益的元素!

世界在变动中,在坚硬的钢铁与顽固的人心相互摧毁的变动中,国家民族忧患加深,个人责任即加重。过去一时文学有“抢群众”趋势,结果群众实未得到,却失去了其真正领导社会改进民族团结功用。(抗战后的中国,且证明用文学教育群众,远不如运用法规教育群众,又简便又能得用)。新的文学观,毫无疑问,它应当在启

迪征服社会着眼。伟大文学作品具有无言之教的功用,既系一事实,目前若干作品如只能娱乐二十岁以下的中学生,将来的文学,还需要它能教育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我们应当承认,如果四十岁左右的中层分子,实在还需要好好施以“人”的教育,是只有文学作品有此能力,别的工具绝不济事的。

文学观既离不了读书人,所以文学运动的重建,一定还得重新由学校培养,学校奠基,学校着手。把文运从“商场”与“官场”中解放出来,再度与“学术”“教育”携手,一面可防止作品过度商品化与作家纯粹清客家奴化,一面且可防止学校中保守退化腐败现象的扩大(这退化腐败现象,目前是到处可见的)。我们还得认识清楚,一个作家在写作观念上,能得到应有的自由,作品中浸透人生的崇高理想,与求真的勇敢批评态度,方可望将真正的时代精神与历史得失,加以表现。能在作品中铸造一种博大坚实富于生气的人格,方能启发教育读者的心灵。这种作家与作品,从表面言来,也许与某一时某一种政治真理相去甚远,事实上不过是与一小部分政客的设计稍稍不同罢了。也许把这个民族的弱点与优点同时提出,好像大不利于目前抗战,事实上我们要建国,便必需从这种作品中注意,有勇气将民族弱点加以修正,方能说到建国!

白话文问题^①

——过去当前和未来检视

从民八起到现在止,整整有了二十年。这二十年来社会的变迁进步,从任何一方面都可以看得出。尤以近十年来各方面的进步,情形十分显明。北伐成功是中国一个转机。北伐成功,固然靠的是几十万武装同志,因信心和理想推之向前,不顾一切牺牲,与军阀决战,得到胜利。但如何在百万国民中产生这点革命可以成功的信心,以及军阀必然崩溃的理想?我们应当知道,这是从“五四”起始,由于几个前进者谈文学革命,充满信心和理想,将“语体文”认定当成一个社会改造民族解放的工具,从各方面来运用这个工具,产生了作用,在国民多数中培养了“信心”和“理想”,因此推动革命,北伐方能成功的。我们如知道当时革命军实力如何薄弱,然而两湖、河南江西数省万千民众,对于革命军又如何欢迎帮助,就会明白从民八起,到民十六止那八个年头,文字力量如何深而普遍影响到北伐,如何有助于北伐成功。

提起“五四”使我们想起最近逝世的蔡老先生。“五四”的领导者,是北平各大学师生,就中以北大师生最兴奋热烈。蔡老先生当

① 本篇发表于一九四〇年四月《战国策》第二期。

时是北大的校长。就职以后他就把“学术自由”实行应用到北大一方面。在学术自由空气中,便酝酿培养了社会改造民族解放种子。因学术自由,语体文运动抬了头,使中国文学从因袭、空洞、虚饰、陈腐俗套中,得到一个面目一新的机会,且变成二十年来这个民族向上挣扎的主力。蔡先生不幸刚好在“五四”运动二十周年,便因病死去了。死后的哀荣,并不足表现这个博大而有远见的人格。正因为此后凡用语体文制作的一切优秀作品,就中便无不有蔡先生人格的光辉照耀。作品之所以优秀特出,必然是作者能深知“五四”文学革命对于工具的“庄严运用”意见而来。蔡老先生虽死了,他的精神应当在此后各种新文学作品中永生。他的名字是中国新文学作者与读者永远值得尊敬的一个名字。

但是看看当前社会另一方面,便使我们感觉到蔡老先生死得似乎太早了一点,实在令人痛苦。只看看老先生死后,公私团体个人所作的四六唁电祭文,如何空洞陈腐,毫无感情,带做作气,想起这一本荣哀录给的却是一个文学革命的先驱,且在他主张语体文二十年以后,等于社会给他那么一个讽刺,不能不使人感到痛苦。如果说语体文的应用,与作委员的,做校长的,办文墨的,制挽联的完全不生关系,还是青年人的特有权利,我们就应当明白为纪念蔡老先生,还需要如何好好运用这个工具,到社会各方面去。这也可说便是一种战争,继续“五四”精神而应有的战争。一切“生存”都代表一种势力,蔡老先生在二十年前,就认定半通不通的死文字,实为社会一种愚昧与顽固,虚伪与陈腐的混合物。社会的进步,不可免会受这种死文字掣肘,有时且引起退化与复古现象。看看这个文字国家,有多少事还只是由军阀官僚时代办文案人物思想继续的传统,我们会知道用近代活文字作工具,向愚昧、顽固、虚伪、陈腐而战,还

值得多少人如何勇敢谨慎来从事这个工作。

代表社会一面既如此无知,另一方面是新文学运动,自从一九二七起始,到上海和商业资本结合后,文学作品产生了商品价值,或成为商品之一种,既具了商品的意义,自然就被用商品方式向国内各处推销。文学刊物书籍因此多而滥,到处流行。由于这个工具的误用与滥用,在国民思想改造上,虽有良好影响,也不免有不良影响。由于政府对这问题的不关心与无知,消极的既不知如何控制它;积极的也不知如何使用它。表现当局对这个问题的不关心与无知,从近几年教育方面即可看出。文字教育虽有目标而无计划。有目标,认为中学生应当养成运用语体文的能力,因此十年前中学教育规程里,就制定各级中学校国文教本,语体文有一定分量,不能减少。初中一年级比例语体文且占百分之七十,不可谓不注重。少计划,因此大学或师范学院国文系或教育系课程表中,就从不曾有关于语体文的课程,俨然一切都得学,惟语体文可不学。直到如今为止,还有许多大学(浙江大学是其中一个),不许学生作语体文,更无机会学语体文,这种学生将来有大部分让他到中学校去教国文,教那种有一半是语体文的课本,结果情形可想而知。凡对大一国文教学有经验和兴趣的朋友,总感觉到中学毕业生国文程度,实在比应有的程度差。不仅古文知识不高明,语体文知识也不够用:不仅语体文写作能力差,即欣赏能力也不好。这件事正说明教育上对这一问题疏忽的必然现象。一部分学生比较好,其所以好,还是在教育以外得了点看杂书的益处。但流行杂书既好坏不一,学生少选择,影响也就有好有坏。关心这件事情的人,若注意到流行小册子内容如何空疏浅薄,就会承认这种小册子的普遍流行,对于青年实在害多利少。正因为它已经成为商品之一种,近年来任何重要问题,专科

形象 的抒情

知识，都有一知半解的妄人或好事者，用辗转稗贩方法，东抄西撮，笼统草率，写成五十页一百页的小册子，大规模分配到各地方去。只因为价钱贱，分布力又广，许多无价值作品，便成为流行读物。社会上许多问题，亦无不由此而起。

用语体文作工具，直接教育既无计划进行，间接教育可以引起不良结果的小册子，却因为它的流行，且常被利用成为破坏国家团结的工具，以及人民真正进步的绊脚石。商人、作者虽各有所得，国民思想却陷入到对一切知识不求甚解或曲解情形中。这些读读小册子即可满足的青年，以为一切政治、经济、文学、科学，表示社会文化与文明的，不过如此如此，因此又照样东抄西撮，称引发挥，来写小册子。（有个某先生，前不久还同我商量，说要写一部中国哲学史，“唯物论”、“唯心论”、“理学”、“玄学”都要重新给它一个解释。我问他看了些什么书，预备用什么材料。才知道他不仅宋元学案没看过，就是几个近人写的哲学史也不曾看过。原来他的雄心与壮志，全是从看小册子得来的！另外还有一个小朋友，大家都称他为“哲学家”，事实上什么书还都看不懂，写语体文就错字连篇，材料全是抄来的，因为无知识，书人名同引用材料，凡是他人著作印错的地方，无不全部好好保留那种错误。商人却因为他写过两本小册子，称他为“青年哲学家”，他自己也就以为是青年哲学家。这两个例正说明“学术”或“文化”两个名词，近十年来到商人手中应用时，能够产生多少可笑的现象。）为补救小册子的弱点，如何找一群有专门知识同时又不缺少流畅文笔的人，写些比较像样的小册子，使一般流行读物，从新陈代谢作用上，减少一点恶影响，增加一点好影响，这是文化机关应作的事。

教育当局应当承认，近二十年有个“文学革命”，它是件事实。

本来“文学革命”虽起始仅仅是个口号,可是在这个口号下已产生过许多作家,无数作品,这些作品一部分,不特影响到青年人生活观念,且成为社会变迁主力之一种。在这个口号下二十年来的活动,虽得失互见,对未来社会变动,无疑的还是一种巨大力量。语体文既已得政府认可,中等学校必需要学生习语体文,可是这个课目谁来教?如何教?大学校的国文系,照习惯课程安排多偏向于古典研究(如老庄文选研究),以及为研究古典而有的准备(如音韵训诂),不仅涉及近二十年来与社会发展不可分的语体文问题,从无人注意到,即与语体文有关,在古典文学中相当重要的戏曲史和小说史,也同样不见于课程表上。我们可以从英文系发现“欧洲小说史”或“十九世纪英国小说”这类题目,却极难见到国文系有“中国小说”这么一个题目。难道从《山海经》、《穆天子传》以下,到清末《官场现形记》为止,这两三千年来中国就没有小说值得作学术研究?难道那么一大堆作品,就不必研究也能了解?大学校或师范学院国文系,既仅就教授便利和课程传统习惯,不给中国小说戏剧一个位置,对于现代中国文学,更不注意,中学课本语体文却占有一个相当分量,一涉及语体文时,既不曾好好的学,当然就只好马虎的教。我们若还记得语体文在国文教科书中所占的比例,自会明白这个“马虎”的结果,会有多大损害和不良影响!这问题我特别提出来,盼望高等教育主持者想一想看。

我们若承认这是教育上一个缺点,想补救它,实需要负责者给它一种较新的看法。个人以为这问题可分三点来处理:

一、从师资上作准备,大学校文史系和师范学院文史系,必需为“现代中国文学”开一门课程,作二三年级必修课。这课程每周至少有四小时,用两小时讲述近三十年来新文学运动各部门作品和作